

来新夏教授学术述略

焦 静 宜

一

来新夏教授字弢盒，号邃谷，浙江省萧山市人。1923年6月8日生于浙江省杭州市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中。童年是在祖父身边度过的。他的祖父来裕恂先生是清末一位有秀才功名的新派人物，是晚清经学大师曲园俞樾先生的高弟，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但新思潮的冲击，使这位长期受封建教育的学者逐渐觉醒，毅然摆脱种种羁绊，于光绪31年东渡扶桑，就读于弘文书院师范科，考察了日本各类学校的教育状况，并曾在横滨主持由孙中山创立的中华学校的教务，希望走教育救国的道路。回国后加入光复会，投身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洪流之中，在当地推行新式教育。辛亥革命后，来裕恂先生不慕荣华，继续从事教育工作，潜心著述，所著有《汉文典》、《匏园诗集》和《萧山县志稿》等。来新夏教授幼年即承祖教，受到严格的启蒙教育，他祖父一面教他熟读《三字经》、《千家诗》和《幼学琼林》等传统蒙学读物；一面又讲些明治维新、康梁变法等史事；闲暇时还谈些地方掌故等。这些对来新夏教授后来选择专业方向有着重要的潜在影响。

来新夏教授高中时就对历史发生了兴趣，读过不少演义性的历史读物。四十年代，在天津读高中时又得到谢国捷老师（后为

河北大学教授，已故）的帮助与指导，开始读二十四史，并撰写第一篇史学论文《汉唐改元释例》。这一初步成果促使他决心学习历史，终于在1942年考入当时名师云集的辅仁大学历史学系。

在辅仁大学的四年，正值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进入艰苦阶段。当时，沦陷的北平民不聊生，他在没有充足经济来源的情况下，靠学习成绩优异而连续四年获得的奖学金勉强度日。虽然生活艰难，但却亲聆了著名史学家陈垣、余嘉锡、张星烺、朱师辙诸师的谆谆教诲。诸师的博大精深、谨严不苟和诲人不倦的精神给了他很多的言教和身教，使他开始步入史学研究的辉煌殿堂。1946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嗣后在天津市新学书院任教。

1949年初，天津解放后不久，来新夏教授被选送至北京华北大学第二部学习。半年后被分配在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教授主持的历史研究室做研究生。从此，他从原来致力的汉唐史的研究领域转向中国近代史领域，直接受教于范文澜教授。范老那种“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精神更给他以深刻的教育，加深了治学中的“求实”信念。他在范老亲自指导下完成了他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中的第一篇论文——《太平天国底商业政策》（署名禹一宁，收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论文集》，三联书店）。

1950年初，他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第三所研究实习员。不久，应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吴廷璆教授之邀，并经范老同意到南开大学执教，开始了教学与科研的学者生涯，由助教循阶晋升至教授。他曾先后担任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图书馆学情报学系主任等职务。现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在学术团体中，他担任着中国地方志协会理事、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常委和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副会长、《津图学刊》主编等社会工作。

他在教学方面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曾先后开设过“中国近代史”、“中国历史文选”、“鸦片战争史专题研究”、“古典目录学”和“文献整理”等课程。他既注重教学内容，使之广博丰富；又十分讲求教学方式，以善于表达、娴于文辞而获得良好效果，深受师生们的好评。在课堂之下，他常以南北朝时的名谚：“青出蓝、蓝谢青，师何常，在明经”自勉，当时作为一名青年教师对人对物都能毫无顾忌和隐讳。他以热情坦率和认真负责的态度，传授治学经验和方法，引导学生进行初步的研究，收到教学相长之效，有不少学生钦佩他的执着，虽异地异时，至老犹保持着不渝的师友之情；但也有一部分人却误解他的真挚严格和勇于任事，但他依然我行我素，不以为意。为了推动史学的发展和为史学界同行创造相互学习与交流的条件，他参加了建国后最早一份专业性期刊《历史教学》创建时期的编委工作，并利用业余时间主动承担了值班责编的繁重任务。

来新夏教授在治学方面虽然才思敏捷，精力过人，但他很强调扎扎实实地做学问，非常注重详细地占有资料，而后认真研究，普遍联系，深入分析，撰写成文，决不作蹈空之论。五、六十年代是他的“厚积”时期。他奔走于各地藏书所，埋头于读书和搜集资料，在十年过程中，他不仅有了可供研究的相当数量的资料储存，而且还寻求到一条治学途径。他认为立足于勤是求学的基点，要手、耳、目、心、脑都勤，就是勤写、勤听、勤读和勤思。四勤的根本在于勤读，勤读方能博涉，博涉方能使知识源源输入，方能逐渐走向专精，即他所常说的“植根于博，专务乎精”。在读的过程中要善于发现问题，即所谓“致疑”。有疑就要不断地寻根究底，这就是“勤思”。疑而后思，思而后得。如思而不得就须一面再去涉猎，一面就要勤问勤听，不仅要听前辈同辈的高见，更要听后辈的新见，只要有一得之见就要吸取。四勤的最后要落实到“勤写”上，尤其是写资料片断和思考点滴，

可以不计文字工拙，久之自能大见效用：一则可借此整理思想，温故知新，发现不足；再则积少成多，渐成文章仓库。由片断成整篇，由多篇成专著。这不仅只是积累，而且还是一种磨砺。经常对资料进行整理、归纳、研究，并在多次反复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而加以论述，这就是来新夏教授的基本治学方法。几十年来，他已养成了随手摘笔记、抄卡片、搞剪报、写提要、记心得和思考问题的习惯，他亲自抄录积累的卡片达数万张，仅研究清人年谱所摘录的史料卡片即达千余张，积沙成丘，终于奠定了储存丰富资料的坚实基础。

他对事业的执着和对学问的孜孜以求也表现出超然无求的精神境界和百折不挠的意志。“勤”固然是治学的不二法门，但人生不可能永远是康衢。挫折、逆境往往会使人消沈、颓废、懒散。六十年代以来，来新夏教授曾被投闲置散，甚至被剥夺了某些权利和自由；但他没有在悲观和嗟叹中虚度时光，仍然怀着强烈的信念，以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坚持读书和写作，即使囚居“牛棚”也尽量利用写“思想汇报”和“检查交代”之余，偷偷地读些书，写点札记。七十年代初，他被下放到津郊去插队落户，别的东西大部分被处理掉，但书箱残稿还是随带到农村。他白天和农民一起压地、打场、掐高粱、掰棒子、出河工；晚上则盘坐土炕上，挑灯伏案，读书和整理被焚剩的残稿断章及凌乱的资料卡片。四年的耕读生活虽然艰苦备尝，屈辱曲全，但读书使他的心灵得到莫大的慰藉，八十年代连续出版问世的几部有影响的学术性著作都是在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点滴余暇，牺牲了应有的休息时间，以一种难以想象的韧性基本恢复完稿。

八十年代初，历史进入了新的阶段，也给来新夏教授送来了第二个学术青春，他的学术才华得到承认，他那蕴积已久的任事才干也渐被发现。他接连承担了一系列的行政领导职务和社会工作，但丝毫没有失去他的书生本色，在简捷而高效地处理着繁琐

的行政事务的同时，仍执着地追求着学术的进益。他为了追回过去由于种种原因而蹉跎的岁月，踔厉风发地加紧作学术上的耕耘。他从未给自己安排过节假日，即使忙于行政事务时，他也保持每天早晚挤出五小时读书和写作的时间，迎来了他学术研究硕果累累的黄金时期。《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1983，上海人民出版社）、《北洋军阀史稿》（1983，湖北人民出版社）、《方志学概论》（1983，福建人民出版社）、《结网录》（1984年，南开大学出版社）、《林则徐年谱》（1984，上海人民出版社）、《天津近代史》（1987，南开大学出版社）、《中国地方志综览》（1988年，黄山书社）、《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简明辞典》（1991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古典目录学》（1991年，中华书局）、《志域探步》（1993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北洋军阀（资料丛刊）》（199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古籍整理散论》（1994年，书目文献出版社）等专门性著述相继问世。他还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以及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为祖国甚至世界的学术繁荣默默地贡献着自己的劳动成果。

与此同时，他对所在任职的南开大学图书馆、出版社和图书馆学情报学系等单位的工作也以勃勃生气为学校的教学、科研作出应有的奉献。他对事业认真负责，不循私情，是非分明，勇于承担责任。由于他在学术上、工作上的优异成绩，1984年被评为天津市市级劳动模范、1989年被评为天津市高教系统优秀教师、1992年国务院为表彰他对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特发给政府特殊津贴。

来新夏教授为了事业后继有人，对培养人才也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于1979年、1983年先后在南开大学分校和总校一手创建了两个图书馆学情报学系，为这一领域培育和输送了多批国家所需的人才。他亲自为高年级学生授课，1978年他为历史系开设《古

典目录学》选修课，由于他厚积薄发的功力和讲求教学艺术而吸引着系内外的学生。正因如此，在一学期内因听课人数不断增加而三次更换教室。他在教学、科研与行政工作的繁重负担的同时，还招收中华民国史和中国图书事业两个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亲自培养高层次人才，为学术研究领域增添新生力量。

由于来新夏教授对学术界的贡献和影响，国内学术界都给予他应有的荣誉。在国际上，他同样得到学术界的尊重，1985年和1991年，他应邀两度到美国多所大学进行访问和讲学，在著名学府哥伦比亚大学、普林西顿大学和俄亥俄大学等校更与外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并发表学术讲演。1991年秋至1992年春，日本独协大学在日本文部省学术基金支持下，礼聘来新夏教授担任列入该校正式编制的客座教授，讲授《中国传统文化的传递》和《中国方志学概论》两门课程，博得该校的高度评价。与此同时，他还与该校经济学部部长齐藤博教授合作编撰《中日地方志比较研究》一书，为地方志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合作开创新局面，受到中日方志界的重视。他还到广岛大学、明治大学、东京女子大学、关西大学、天理大学、爱知学院大学等校进行演讲和学术交流。通过彼此广泛的接触，向日本学术界介绍了中国学术界的成就，为加强中日两国史学界、方志学界和图书馆界的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由于来新夏教授所作的贡献。他的名字和业绩被“无偿地”连续列入国内外许多著名的辞书和传记中，使他的成就得到应有的承认。

综观来新夏教授的学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中国近现代史、古典目录学和方志学三个方面。

二

来新夏教授对中国历史的研究相对地集中于自清代中后期至民国时期这一历史阶段。1951年发表问世的《太平天国底商业政

策》一文是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习作和建国后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以后，随着学术界的发展形势和个人的学术进益，他连续发表了《中日马关订约之际的反割台运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谈民国初年白朗领导的农民起义》等有份量的文章。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根据充分可信的史料，比较研究，深入分析中国近代史上的史事。从六十年代开始，由于客观原因的限制，迫使他将研究方向逐渐转向目录学，但他并没有放弃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从七十年代末以来，他所发表的有关史学方面的论文，诸如《论北洋军阀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清代前期的商业》、《清代前期的地主阶级结构的变化问题》、《王鸣盛学术述评》等文仍能看到他对史学研究的力度和浓厚的兴趣。

来新夏教授在史学研究方面的特点是善于开拓新领域，深入发掘新史源。建国以后，他见于民国史中的北洋军阀史始终处于一种冷漠的禁区状态，遂立意从事北洋军阀集团纷杂的兴衰变化史事的研究，从大量的档册报刊图书中抽绎出接近历史真实的论述，并于1957年在少所依傍的情况下完成和出版了这一领域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北洋军阀史略》。在此以前虽然有过一些史话和单篇论文的撰作，但这本十余万字的《北洋军阀史略》不可否认地把北洋军阀史置入专史研究领域而具有适应时代要求的筚路蓝缕之功。来新夏教授在这本专著中将北洋军阀的形成、发展、纷争和覆灭的过程作了较为全面的叙述，在教学和研究领域中发挥了有益的作用，并在国际上产生过影响。日本明治大学岩崎富久男教授与来新夏教授在未谋一面，未通一信情况下，不顾当时热火朝天的文化大革命中来新夏教授的处境和遭遇如何，从该书的参考价值出发，于1969年毅然翻译，并由日本桃源社出版，引起日本史学界的关注。1989年又由光风社再版，得到日本学者的好评。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近二十年过程中，由于政治原

因的影响，对于北洋军阀史的分析、研究与撰述是非常薄弱的，但是，来新夏教授不改初衷，执着地进行着资料积累和个案研究。八十年代初，随着学术事业的昌盛，学术研究在厚积的基础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他不仅仅限于史实和人物的研究和评述上，而且对若干理论性问题也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对“军阀”、“北洋军阀”、“北洋军阀史”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的概念定义，北洋军阀的阶级属性、北洋军阀史的划阶段问题、北洋军阀的特点等均有较多的突破和进展。1983年，来新夏教授主编和撰写的《北洋军阀史稿》仍由湖北人民出版社继《北洋军阀史略》之后正式出版。《史稿》是在《史略》的基础上更补充和运用了已刊和未刊的图书、档案、译稿及报刊等新资料，丰富了具体内容。他还广泛地吸取学术性研究成果，撷取菁华，提出自己新的分析和论断。因此，比较集中地体现当时北洋军阀史研究的水平，被学术界认为是“民国史研究领域中一个良好的开端”，“它将为后来的研究者起着提携与带头的作用”。

为了推动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和为研究者节翻检之劳，来新夏教授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之约，主持编辑了大型系列资料丛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的《北洋军阀》，收录有关北洋军阀形成、发展和覆灭等各阶段的重要资料，包括档案、传记、专集、杂著、报刊和汇编等。他邀集一批中青年学者共事，身体力行地既负责全面的主编指导，又承担具体分册的编选工作，经过近三年的艰苦地搜集，筛选和认真整理、标点工作。这部五巨册300余万字的大型资料汇编终于从1987至1993年间陆续分册出版问世，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好评。

来新夏教授对史学研究始终贯穿着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愫。他在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中，对中国近代史开端时的民族英雄林则徐怀着强烈钦敬之情；他从林则徐开眼看世界、严禁鸦

片、坚决抗英和关心民瘼等等言行深刻地认识到林则徐不仅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爱国者，是中国近代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有作为的政治家；也是封建社会中具有同时代人物所少有或没有的特色，并作出过无愧于时代的历史贡献，是对近代中国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于是，他决心编写一部既能准确而丰满地再现林则徐的光采形象，又便于学人参考利用的《林则徐年谱》。他历时十年，搜求积累资料，认真研究考证，精心排比撰著，终于在1964年经三易其稿而杀青，贮之书篋以待枣梨。不幸为“文革”之火所焚，幸初二稿杂于乱纸堆而获存，乃于落户乡郊之少暇重加整理，恢复旧观。1982年，完稿近二十年，方得其老友汤纲教授援手，介付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包含大量有关林则徐的公私档册、已刊和未刊的图书资料达160余种，对谱主的思想 and 活动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和评介，并提出了诸多新见解。他还对年谱的编纂体例有所建树。旧年谱往往存在孤立地铺陈个人活动，读后难以达到“知人论世”的目的；《林则徐年谱》则能把谱主置于十九世纪中叶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背景下来叙述，使林则徐的言论和行动能与整个时代，整个社会，整个民族有血有肉地联系起来。《林则徐年谱》以丰富的资料，精当的考释，突出的主题以及夹议的写法深得学术界好评，不仅反映了作者的学术功力，也处处洋溢着强烈的爱国深情。正如有的学者评称“《林则徐年谱》是一份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

来新夏教授虽然潜研学术，但不赞成独学无友。他热心地参加中国近代史领域中的几次重大讨论，如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太平天国革命性质等，通过学术交流和探讨来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来新夏教授在史学研究方面除专著外还在国内重要专业性刊物上发表过数十篇论文，均以翔实的史料及条畅的文字见称于时，他将有关清史和近代史的论文分别收集为《中国近代史述丛》（1983年，齐鲁书社）和《结网录》（1984年，南开大学出版社）。

来新夏教授主张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要植根于对本土文化中精华部分的继承和糟粕部分的扬弃，才能总结历史的经验，而为现实服务。他曾针对流行一时的某些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以历史的经典著作《史记》为例说明这部巨著之所以能经两千余年而不衰的生命力即得力于其能审慎地优选传统文化，并输入时代精神。他认为：儒家文化虽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若以儒家文化来概括传统文化，则既失之于泛，又失之于偏，并不准确。因为儒家文化实际上已杂揉进多种文化来源。他更认为：当前海内外一些学者倡导的儒学复兴主张，主要是由于这些人把儒家文化视作单一的凝固体，以作为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儒家文化来代替中国传统文化的全体，因而不仅不能正确地选择传统文化，对建设新文化也似乎无补实际。

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是民族精神的一种集中体现，其中包含着由对国家、对民族深厚感情所产生的凝聚力。来新夏教授认为用乡土教材进行爱祖国、爱人民的教育是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提高全民族精神素质的切实方法和途径。他曾对访问者阐述过他的观点说：“建设社会主义，不光是‘物’，更重要的还有‘人’的精神世界和不同层次的文化需要。各地都有自己的发展史，这些都是十分珍贵的财富，对我们今天的事业上有借鉴作用。我们搞历史研究的人更有责任去宣传灌输我们国家的历史和地方的历史。”1986年，他主编出版了《天津近代史》。在编写过程中，他始终贯穿着这样一个指导思想。这部书共引用了200多种资料，并插有图片和附表，使读者更形象地了解近代天津的发展历程。所以当该书一问世即博得各界的好评，销量达到3万余册，成为出版低谷时期的难得现象。

三

来新夏教授对中国传统目录学的研究发轫于学生时代。当他

负笈于辅仁大学时，曾受业于久负盛名的目录学家余嘉锡先生之门。他在老师的指点下，以一部《书目答问》为入门书，渐入古典目录学的堂奥。他始而以目录学知识为治学工具，广涉博览，得治史之利便；继因工作需要转而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六十年代初，他被投闲置散，只能寄情书海，于是重理旧业，专致力于古典目录学的研究，十几个寒暑的冷风苦雨，他完成了两部古典目录学方面的专著。

一部是《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这部书设想于其面世前的二十六年。他怀着一种“甘当铺路石子”的精神，从事“为人之学”。他为能节他人翻检之劳而编写这样一部研究性的工具书。在二十多年进程中，他细心检读了自清以来的人物年谱共800多种、1200余卷，每读一谱，即撰一录，不仅著录了谱名、谱主姓名、生卒年月、编者、版本，而且还注明藏所、简介谱主生平、叙述编谱缘起及特点，考订著录异同，指明史料所在，体现着作者的学识水平和深厚的功底。书尾附录有见载于他书或传闻自他人而未经眼之年谱140余种，各写提要，标作《知而未见录》，另有谱名、谱主索引两种，以利便读者。这既是编制方法上的改进，又可见作者谨严、审慎的治学态度和关心读者的苦心。来新夏教授在素材积累有定数后即着手编纂，六经寒暑，三易其稿，终成五十余万字巨帙，并以墨笔工楷写定。不料“文革”烈火点燃，此手稿竟被投之丙丁。来新夏教授不顾那些少不更事勇士们的推搡，从十多册手稿中抢出二册。1970年，他下放津郊。在劳动之余，重新写作，又前后经二年的艰辛，使这部凝聚近三十年心血，具有颇高学术价值的目录学专著终于再次成稿，于八十年代初问世。由于这部书的学术价值和在海内外学术界的影响，1989年，这部专著获得中国图书馆学会优秀科研成果特别奖。

另一部是《古典目录学》。这是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古典目录学源流、发展和基本方法，以论证性为特点的学术专著。它的初

印本《古典目录学浅说》（1983年，中华书局）是建国后最早正式出版的一本今人目录学专著。来新夏教授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独抒己见，对目录的概念、目录学的产生、类别、体制、作用等基本理论和方法诸问题都作了精辟的论述，并按历史发展的朝代顺序，抓住特点，勾勒轮廓，完成一部深入浅出，使枯燥内容化为引人入胜的专著。他在初版中虽自谦为“只是一般探讨和尝试”，但书一问世，即引起人们对旧学问的新感觉，评介文字层出，并被列入国家教委的“七五”教材规划之中，数所高校的历史学和图书馆学专业采为教材。其后，来新夏教授又尽一年之劳以《古典目录学浅说》为基础，悉心增订，发抒新见，进一步完善为《古典目录学》一书，经专家评审列为大学教材，于1991年仍由中华书局出版，不逾年即再版，供高等院校历史学、汉语言文学、文献学、图书馆学等系科使用。老一辈的资深图书馆学专家顾廷龙教授读后评定该书说：“此作广征博引，深入浅出，叙述简要，议论平实，颇多创见，是为研究古典文献及传统目录学者入门之阶梯”，给来新夏教授及其所著以公允的评价。

来新夏教授以其渊博学识，充沛精力和善于思考的能力，特别喜欢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七、八十年代，在南开大学总校和分校图书馆学系主持教学行政管理工作时，他敏感到图书馆学研究教学中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他反复思考论证，认为应从全新角度来自建体系。他以高屋建瓴的气魄和笔法，策划合中国图书史、中国目录学史和中国图书馆史三史为一体的学术著作《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这一著作的基本内容是以图书为中心而涉及与图书有关的各种事业，包括搜求、典藏、管理、整理和编纂等。他以图书形态发展的特点为主要标志，将中国古代的图书事业划为创始阶段（周、秦）、兴起阶段（两汉、魏晋南北朝）、发展阶段（隋唐五代）、兴盛阶段（宋、辽、夏、金、元）、全盛阶段（明、清）。该书既非学术发展史，也非历史著述史，而

是作为专史将围绕图书而展开的各种事业进行综合性考察，叙述了中国古代图书事业的辉煌成就，总结了中国图书文化的优秀传统及其历史地位，为中国图书馆学的研究又开辟了一个新领域。1990年4月，《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列入海内外享誉极高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中而出版问世，引起了大陆、港台以及日、美等国学术界，特别是图书馆学界的很大反响。1991年10月，来新夏教授即以此书为主要依据，简编为《薪传编》列入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中华文化集粹丛书》中；不久，又有台湾繁体字本之印行，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向海峡两岸青年宣传和普及文化知识作出了重要贡献。

来新夏教授不仅以著书立说来推动图书馆学学术研究的前进，还满怀热情地倾注其精力于图书馆学教育，为社会培养这方面所急需的人才。他任人唯贤，严格聘用师资，组织全国同类系科，主编了《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列教程》，以保证教学质量。目前已出版8种，为不少学校所采用，并获得南开大学优秀教材建设奖。他亲自参与编写的《社会科学文献检索与利用》一书被全国多所高校作为公共课的通用教材，并于1986年获得国家科委颁发的科技情报集体成果三等奖。来新夏教授鉴于图书、情报、档案三学科缺乏适用的工具书，乃殚精竭虑，悉心策划，组织了13所院校的专业人员共同编写了近90万字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简明辞典》（1991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并由他最后通阅定稿，成为第一部容三个学科于一书的中型工具书。

来新夏教授以目录学奠基，还涉足于古籍的整理与研究。他接受国家教委的委托，承担了《中国史学名著选》中《史记选》的标点、注释工作，于1990年完成并由中华书局出版，使包含前四史与左传、通鉴六大史学名著在内的丛刊得以成套，为文史学科的基础课提供了必需教材。其它还整理和校点了《阅世编》（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闽小纪、闽杂记》（1985年，

福建人民出版社)和《清嘉录》(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为历史学的研究提供可资参考的史料等方面有其一定的价值。最近,他还把历来用以整理古籍的传统方法,分篇著文,撰成《古籍整理散论》作后学之津梁,1994年6月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四

来新夏教授的祖父来裕恂先生既是一位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的学者,又是一位地方志专家,曾两度参与故乡方志——《萧山县志》的编纂工作,并于1948年在艰苦条件下,一手完成70余万字的民国时期最后一部志书——《萧山县志稿》(1991年,天津古籍出版社)。来新夏教授从小就受到家学的影响,对地方志有较深的印象。四十年代中期,他就读于大学时,由于专业的需要曾翻读过若干种县志,得识其体例。还通过对历次所修萧山县志的比较和研究来加深对志书这种专门性著述体裁的理解和认识,并撰写过一篇《萧山志要读后》刊诸报端。这是他在方志学方面的第一篇文章。

五十年代初,来新夏教授从事史学研究工作,地方志成为他不可或缺的史料来源。在当时,人们对地方志资料尚较少注意,而他即已开始对这一资料宝库加以发掘,并用之于史学研究。1957年,《历史研究》11月号上发表的《试论清光绪末年的广西农民大起义》一文即是他利用地方志资料为重要论据的学术论文。他把过去长期被人忽视的清末最后一次农民起义的基本情况理清,提供了不少难得的史料,填补了中国近代史领域中的一项空白。

六十年代,随着编写“四史”活动的展开,来新夏教授曾参与了河北省《丰润县志》、(霸县)《东台山志》、(盐山)《南阡志》等志书的编写工作。在此期间,他还应倡导修志工作

的梁寒冰同志的嘱托，拟定编志草案，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发起编写社会主义新志书的工作。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编志工作由于志书包罗社会各个方面，当然被视为应加批判的对象，而倡导和草拟工作计划的人也无疑负有“举逸民”的“罪行”。人为的干扰使处在起步状态的修志工作遂告搁浅。

八十年代初，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修志工作又得复苏。梁寒冰同志等再倡盛举，又于1980年在天津召开成立中国地方史志协会预备会。来新夏教授受委托在会上作了《总结旧志，创编新志》的发言，提出了在新时期创编社会主义新志的若干创见和思路，受到与会者的赞同与支持，其中核心思想和许多提法成为日后指导全国地方志编写工作的规范和原则。由这篇发言修订成《略论地方志的研究状况与趋势》一文在《天津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后，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广泛的影响，日本东北大学的寺田隆信教授视之为代表中国地方志研究领先水平的文章，并为之译为日文，发表于《东洋史论集》（1984年第1期）上，介绍给日本学者。

1981年8月，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在山西太原举行成立大会，来新夏教授当选为理事，分工负责全国地方志编修人员的培训工作。为了适应培训工作的急需，他立即组织了八所高校的教师和科研人员编写教材，开始筹划全国性的人员培训工作。在1982年的全年中，他分华东、西北、华中、华北几大区域，仆仆于苏州、太原、武汉、蓟县等地主办和参与了四期培训班，轮训了省、市、县各级修志主编和编修人员达千余名之多，为编修新志奠定了人才基础。1983年，他又在经过多次用以讲授的教材上，重新修订，改编成《方志学概论》，由福建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问世。这是建国后最早一种体系较完整的方志学专著。

随着全国范围内编写新志工作的开展，来新夏教授对方志学的研究逐渐深入。他首先对中国地方志进行了历史的总结，指

出：“中国地方志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它是记载某一地区自然、历史、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纵横各方面的情况和资料的一种著述体裁；是对地方情况进行综合性反映的百科全书；是撰述历史借以取材的资料宝库之一；是华夏文化宝库中卷帙繁多、内容丰富的一块非常引人注目的瑰宝。回顾两千多年的方志发展史，不仅有大量的各类型志书，而且还开拓了方志学的研究领域，撰述了若干专著，流传给后世一份丰富而宝贵的历史遗产。”他对地方志的发展源流、体例门类、方法理论、学术价值、编修制度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还对历代修志事业进行了客观的总结。他最早提出新编地方志的四点标准，那就是：

一、政治标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明确“修志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两个文明服务”的目的。政治标准包含着指导思想和政策要求两项具体内容。

二、论述标准：要注意三个方面，一是全面性，使志书能成为提供全面资料的一部书；二是时代性，要以新材料体现出时代的特点；三是地方性，要使新志书在共性基础上突出地方特色以表述个性。

三、资料标准：志书要重视资料，以资料为论述的基础，而不能成为资料汇编。使用资料既要广征博引，又要严加考辨甄选。对于旧志资料要正确地以批判继承的观点来对待。

四、结构与文字标准：应广采诸体，综合表述，文风端正，严谨朴实；不滥用辞藻，不虚誉，不溢美。

这是来新夏教授在总结前人成果和新编志书经验后所提出的创见。它得到了方志学界许多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认同，认为它体现出新编志书的特点和要求，它一直被用作编写和检验新编志书的综合要求和基本标准。同时，来新夏教授认为按照四点标准而编写成的志书的整体效应是：①全面反映本地区的历史和现状；②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③进行爱国主义与革命传统教

育的乡土教材；④保持地方文献，以储料备征。这就将编修地方志工作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提到一个更新的高度。

在全国编修新志起步和推进期间，来新夏教授还针对编志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撰写并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对编志人员难于掌握的理论问题如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的问题作过深入浅出的阐释；对诸如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编纂体例的设计等若干具体问题都进行了细致的指导；而且还就编写工作中把握不定的一些问题，如史志关系、分志与总志的关系、资料与论述的关系、新志与旧志的关系、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全面与重点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为了提高和确保新编志书的质量，他积极倡导加强志书的审稿与评书工作。指出：“地方志书硕果累累的时代行将到来，为使这一盛世大业能在文化史上占有光彩的一页，量多质优确为关键。”他更把审评工作的总结编志经验提到嘉惠后学，谋及子孙的高度来评价。他不仅宣传提倡，而且还身体力行，不辞辛劳，参加过几十部市县志的审评工作，并撰写评论文章，中肯地提出意见和建议。在他的指导下，早期的《萧山县志》和后来的《青州市志》、《盐山县志》、《蓟县志》等都分别获得科研成果奖和方志界的一致好评。

来新夏教授通过修志工作的具体参与，日益认识到：提高修志事业的学术地位乃取决于这一学科的研究水平，遂首先提出并多次呼吁必须加强方志与方志学的研究。他认为：建立新的方志学即方志科学的体系将是从事这一领域工作的学者进行研究工作的重点：应对旧方志学与方志科学的区界、方志科学的学科地位、方志科学的研究对象和体系结构等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进一步提出撰写一部有一定水平的《中国方志学》的设想和尽快付之实现，促进方志科学的研究获得新的成就。同时，他也很注重旧志资料的整理，特别是长期为人忽视的风土小志，认为“风土小志为方志之支流，记一地物产民风、遗闻琐事，既可

资掌故谈助之掇拾，又可备地方志料之采择”，他亲自动手点校整理过若干种颇具史料价值的风土小志印行问世。

为了加强方志学的研究与旧志整理工作，经国家教育委员会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批准，于1984年在南开大学成立了以来新夏教授为主任的地方文献研究室。这是国家教委在全国高校范围内唯一专设以从事地方文献研究的机构，几年来已取得一定成绩，编写出版了《天津风土丛书》（1986年，天津古籍出版社）、《中国地方志综览》（1988年，黄山书社）、《河北地方志提要》（1992年，天津大学出版社）等，这些成果无疑为中国地方志领域的繁荣增添了光彩。

来新夏教授为把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志学研究推向国际学术领域，积极向美、日等国学术界介绍中国方志学的历史与现状。1991年春，他访问美国，曾应邀在哥伦比亚大学讲过“旧志整理与利用”这一专题，并对该校馆藏中国方志作出评估，受到颇高评价。随后在他应聘出任日本独协大学客座教授期间，又向该校本科生及研究生讲授“中国方志学概论”，博得师生的赞扬，引起日本学术界对中国方志的广泛重视。与此同时，他还开始了与日本独协大学经济学部部长齐藤博教授进行“中日地方志比较研究”课题的国际学术合作研究工作。这一项目得到日本文部省学术基金的专项支持，是中国方志学推向国际性研究的创举。来新夏教授与齐藤博教授分别组织中日两国一流学者研究并撰写论文，于1994年秋完成了《中日地方志比较研究》，将由中国南开大学出版社和日本学文社分别出版中、日文本，使这项开拓性的学术研究成果公之于世。这一国际合作研究活动曾被列为中国方志界1992年十件大事之一，对国内方志界产生一定的影响。

五

来新夏教授的人生道路是曲折坎坷的，但他能不计荣辱、坚

韧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他在回顾自己人生道路时曾说：“一个人生下来就是为做事，但人有巧拙之分。巧是天赋，拙就靠勤来补，所以我无论做事、治学都遵循‘勤能补拙’这一条人所共知的格言。一帆风顺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幸运’，多数人是在坎坷崎岖道路上走完漫长的人生历程。一遇挫折就灰心丧气，自暴自弃，这是没有出息的可怜虫；或者怨天尤人，嫉视成功者，这是没有志气的窝囊废，重要的是自己不能垮，要象鲁迅那样进行韧性的战斗。”来新夏教授确是按照自己的路在走。六十年代初，他曾因某种不是原因的原因受到十几年投闲置散的冷遇，被迫离开了讲坛；但他一直兢兢自守，勤奋钻研，终于以一种韧性等待到重登讲台的机遇。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欢悦心情，曾采用自己不常用的表达形式，自我酬答地填写了两首词说：

“十年不识灵山路，鹫岭云深，碧海情深，闲却禅关一片心。
振衣重上青莲座，贝叶经新，桃李枝新，散尽天花不着尘”。

“鹅湖一别十年路，洙泗源深，弦诵情深，触动扶风绛帐心。
芸台重返春风生，花事惊春，桃李全新，那得维摩不着尘。”

来新夏教授不仅如此对待人生，也以这样一种道理做学问。他把这种精神概括为“立足于勤，持之以韧”，并以之作为自己奉行的格言。正是这种“勤”与“韧”的精神使他的学术生涯不断地勃发着生机。

来新夏教授现已年逾古稀，虽然已是桃李满园，成果累累，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应该超凡脱俗，安享晚年；但是他却依然席不暇暖，忙于各种学术活动和著述不辍。他经常以“人生难得老更忙”自豪。1993年，为祝贺他七十华诞而出版了《志域探步》一书，他在卷首写了一首自赞自嘲的白话诗，除了概括平生行迹外，结尾则写上“只要不死，台阶还要再上”的壮语。目前，他除了不断为一些报刊写点抒发感情的杂文以自我陶冶外，还在认真地按照自己的科研方向从事艰苦的科研工作，继续耕耘在自己

的可耕田中。

来新夏教授对他致力的三个领域的不懈努力正显示他热爱学术的精神，他会以言信行果的态度去完成自己的许诺。愿来新夏教授克享高年，永葆学术青春，为学术界增添应有的光采。

作者工作单位：南开大学出版社

（本文责任编辑：曹月堂）

《史记》辨误一则

中华书局校点本《史记·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列传》：“今臣至，大王见臣列观，礼节甚倨；得璧，传之美人，以戏弄臣。臣观大王无意偿赵王城邑，故臣复取璧。”“戏弄臣”一语，于理难通。

《艺文类聚》卷第十七此段引文曰：“今大王见臣，礼节甚倨；得璧传之美人以戏弄。故臣复取璧。”同书卷第八十四引文曰：“今大王见臣甚倨，得璧传之美人，以为戏弄，无偿赵王城邑。故臣复取璧。”唐类书引文，“戏弄”之后，并无“臣”字。《太平御览》卷四百三十三引《史记》文曰：“今臣至，大王见臣列观，礼节甚倨，得璧传戏，无偿赵王城邑。故臣复取璧。”同书卷四百八十三引文作：“今臣至，大王见臣列观，礼节甚倨；得璧，传之以示美人，以戏弄臣。臣观大王无偿城意，故臣复取璧。”卷八百〇六引文为：“今大王得璧，传之美人以戏弄。臣观王无意赵王城邑，臣复取璧。”该书三处引文，其中两例“戏弄”或“戏”后亦无委“臣”字，一例有“臣”字。

类书引文，多取其意，不泥于辞。以义理言之，秦王幸而得璧，喜不自禁，将之传给侍女玩赏，合情入理，并无以此戏弄蔺相如之意。类书引文和义理分析均可证明，《史记》原文“戏弄”后，似本无“臣”字。

· 李占伦 ·